

迎接一九〇〇年

——中國怎樣走近二十世紀

● 劉廣京

公元1899年12月30日的夜半，梁啟超（1873-1929）在太平洋中的一艘輪船上，自日本來，駛近夏威夷。這時離開1900年還有二十四小時^①。梁啟超所撰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裏說^②：

亞洲大陸有一士，
自名任公其姓梁，
盡瘁國事不得志，
斷髮胡服走扶桑。
扶桑之居讀書尚友既一載，
耳目神氣頗發皇。
少年懸弧四方志，
未敢久戀蓬萊鄉。
誓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
問政求學觀其光。

這是說梁啟超自1894年中日戰爭爆發之後便奔走國事。1895年他在北京考進士時，起初是聯合廣東舉人一百九十人，後來又幫助他的老師康有為聯合十八省在京考試的舉人一千二百餘人（現存題名有六百多人），請都察院代奏，要求皇上下詔罪己，拒絕和議，實行變法。^③當時的變法主張雖然仍用過去的求人才、圖自強等成語，但同時卻提出幅度相當寬廣的方案，包括改革科舉及開放言路；不但要准許「百僚奏事」，而且要實行「議郎」制度。府縣約十萬戶舉一人，隨時可請皇上召見，並可代表輿論，議駁皇帝的詔書。「凡內外興革大政，籌餉事宜，皆令議於太和門，三占從二，下施部行，所有人員歲一更換。」^④這一次的公車上書都察院不允代奏，梁啟超等乃在北京組織強學會，以新知識聯絡京官中之好奇者：「備置圖書儀器，邀人來觀，冀輸入世界之智識於我國民，且於講學之外，謀政治之改革。」^⑤梁啟超那一年在北京考進士沒有考上。但是變法運動已經發動了。

這以後三年梁啟超與康有為同是變法運動的主要喉舌。康有為於1895年中了進士，得到一個工部主事小官，除了策應各地組織學會的事

外，一次又一次上書請人代奏皇上，想說動光緒帝要朝廷主持變法。梁啟超自1896年起的重要貢獻就是任上海《時務報》旬刊的主筆。他所寫的文章平易流暢，「筆鋒常帶情感」。《時務報》不久銷售一萬多份，對這時的啟蒙運動大有帮助^⑥。這時他已經讀到嚴復翻譯《天演論》的稿本，同時又受到譚嗣同激進思想的影響。梁啟超一向欽服康有為關於孔子主張改制、孟子提倡大同的學說。到了1896年梁更相信變法是世界之公理，又是國家存亡的關鍵。至於如何變法，他則着重改革科舉制度、興學校、變官制。他說：「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之大成在變官制。」^⑦

梁啟超編《西學書目表》，就已有的中文書籍、雜誌提倡西學，並提倡翻譯新書。同時他認為中國古書至少有一部分已為西學提供論據。實際上他主張以一整套從小學到大學的學制來代替科舉制度。「入小學者比諸生；入大學者比舉人；大學學成比進士，選其尤異者出洋學習，比翰林院庶吉士。」^⑧梁氏同時主張設幼學及女學。人世間絕不只有男子有才。「夫必謂彼二萬萬為人才，而謂此二萬萬為非人才，此何說也？」梁啟超主張男女平等，君民平等，已和譚嗣同的看法相似：「不平等惡乎起？起於尚力。平等惡乎起？起於尚仁。等是人也，命之曰民則為君者從以臣妾之。命之曰女則為男者從而奴隸之。」^⑨梁啟超雖然沒有像譚嗣同那樣說要在倫理思想上「衝決網羅」，但他似乎已有這種趨向了。

梁啟超在《時務報》裏討論到民權問題。他認為泰西各國之所以強，是因為有議院：「君權與民權合，則情易通；議法與行法分，則事易就。」^⑩但在《時務報》上他還沒有公開呼籲開議院。他只主張先多設學校以開民智，同時則發展商務及工礦等企業以為立國的基礎；同時又講求法律以明君民上下間之權限。梁啟超為《時務報》主筆的頭一年政論還相當含蓄。但是1897年秋季他接受聘請為長沙時務學堂的總教習時，思想已趨於激烈，已和朋友討論如何採取「急進法」，如何「以徹底改革洞開民智」^⑪。他當時的看法是要從自辦學校、多造就變法人才入手。湖南省本來氣氛極為保守，但是這時有不少士紳已經願意接受西藝，如內湖內江行駛輪船等。1897年秋冬之間湖南省會長沙恰巧是傑出的開明人物會聚之所。陳寶箴任巡撫，黃遵憲任臬司。先後任學政的江標、徐仁鑄同情西學，在府試裏出了一些有關時務與世界知識的題目，在經學上同情於康學。這一年春間已創辦的《湘學報》由譚嗣同的好朋友唐才常編輯，後來譚嗣同也來幫助。梁啟超為時務學堂的一百多個學生講《孟子》和《春秋公羊傳》，強調孟子已經有大同的理想，早已道出西政之學的奧秘。梁啟超後來追憶時務學堂時期「我們的教學方法有兩面旗幟：一是陸王派的修養論；一是借《公羊》、《孟子》發揮民權的政治論……開學幾個月後，同學們的思想不知不覺就起劇烈的變化。他們像得了一種新的信仰，不獨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傳」。^⑫

1897年秋季時局有新的震撼。11月1日山東鉅野縣有兩個德國教士被殺。同月14日，德艦佔領膠州灣。12月15日俄國軍艦駛入旅順港^⑬。先是法國已要求於鄰接越南的雲南省建造鐵路及在粵、桂、滇三省開礦，形成法國的勢力範圍。這一年年末中國的確有被瓜分的危險。梁啟超向湖南巡撫陳寶箴說：「為今之計，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後中

國有一線之生路。」梁寫了一篇《論湖南應辦之事》，要開民智、紳智、官智。州縣要遍設學堂。全省「官課、師課」全改教時務，再由學政大力提倡西學，「兩管齊下，則其力量亞於變科舉者無幾矣」^⑭。接着譚嗣同等提議設立南學會，要湖南各州縣各派有才識的士紳數名入會，於講習功課之外，兼看一般公文，以為議事之準備。南學會於1898年2月成立時，梁啟超已經離長沙，但他在《時務報》發表《南學會敘》說南學會的目的是要做到



梁啟超像

「官與官接、官與士接、士與民接、省與省接，為中國熱力之起點」^⑮——也就是藉學會來實行省議會的制度。

梁啟超於1898年2月回到北京。這一年他考進士又沒有中。4月裏他幫康有為組織保國會，要結合開明的京官推進保國、保民、保教（孔教）的變法運動。第二次開會梁啟超發表激昂的演說；但是保國會因被人彈劾而不能不中輟。這一年在京考試的各省舉人紛紛遞呈抗議德國人在山東即墨縣毀壞孔廟聖像，但是梁啟超等一百多個舉人於5月裏上書主張考試制度應廢八股——這一點許多舉人都反對，更難望都察院和總理衙門代奏了。這一年最奇特的發展是光緒皇帝對於變法的決心。光緒帝於1889年起已親政，但重要的政事與官員的任命，仍由慈禧太后決定。光緒的百日維新，不能說全是由康、梁導演。康、梁直接與光緒接觸的機會不多。但是康、梁的意見為一部分京官及光緒帝所接受，百日維新所發的論旨有許多和康、梁的主張相似，歷史上的意義是很重大的^⑯。

光緒帝於6月11日下詔定國是，揭櫫「變法自強」的大目標。接着自6月13日起，有兩道諭旨規定自下科始，各級考試都要廢八股，代以策論。康有為於6月16日召見，梁啟超於7月3日召見，都沒有得到有重要權力的職位。康被派為總理衙門章京（秘書），嗣改派為上海《時務報》的督辦。《時務報》原為私辦，現在要官辦了。梁啟超被派主持譯書局，嗣上奏請儘先翻譯有關西洋法律及政治的書籍。康、梁都知道朝廷實權是操在慈禧太后及守舊大臣手裏。但是光緒帝決心變法，使康、梁非常感奮。這一年也到北京來的譚嗣同雖然批評君主制度，但對光緒帝的熱心變法，也是由衷地感佩。

光緒帝於這一年6月至9月之間差不多一百天內發了幾十道重要的維新諭旨^⑰。教育方面除了廢八股外，要辦理京師大學堂，改各省書院為兼習中、西學的學校；義學、社學亦令中、西學兼習。經濟方面的新政諭旨設礦務鐵路總局，頒農學會章程，並令各省設商務局。最可注意的是光緒帝注重政治上的改革——要破除上、下之間的隔閡，在帝制之下維護上書言事的自由。8月2日的諭旨令大小臣工各抒讜論，士民上書言事，赴都察院呈遞，不許阻隔。接着禮部主事王照上書，該部未為代

奏；光緒帝乃於9月4日罷該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騫及四個侍郎的職；另擇裕祿、李端棻等充補。9月5日諭旨命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四人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即充軍機處的秘書人員），參與新政事宜。一個星期後，於9月12日光緒帝下一道頌揚西法的諭旨，布告天下：「國家振興庶政，兼采西法，誠以為民立政，中西所同，……今士大夫昧於域外之觀者，幾若彼中全無條教；不知西國政治之學千端萬緒，主於為民開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質，延人壽命。凡生人應得之利益，務令其推廣無遺。」^⑩從十九世紀中國介紹西洋文明的觀點，這一篇諭旨是極動人的文獻。

但是這就快到百日維新的落幕時了。9月中旬光緒帝準備開懋勤殿（就是新設一個中樞機構，來討論政制的改革），又重申士民都可以上書，「由本省、道、府隨時代奏」，開放基層的言論^⑪。當時傳言光緒帝要聘用那時在北京旅遊的李提摩太（英國教士）和伊藤博文（日本政治家）為顧問。也有人說光緒帝和康、梁等人有密謀。到了9月21日，慈禧不再等待了。她於19日自頤和園返紫禁城。21日的諭旨用光緒帝的名義，請求太后訓政。同日着步軍統領衙門拏辦康有為、梁啟超及康的弟弟廣仁。第二日，步軍統領衙門的官弁在紫禁城、西苑門、頤和園三處巡邏。光緒帝最晚在23日已被幽禁於南海瀛臺，23日同情康、梁的侍讀學士徐致靖、御史楊深秀等及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被捕。接着兩三日內參與新政的四京卿（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被捕。這四人和徐致靖、楊深秀本來要交刑部、都察院審訊。但是9月28日，這四人和楊深秀、康廣仁都先殺了。徐致靖的處分是永遠監禁，張蔭桓流放到新疆（後來還是殺了）。光緒任命的禮部尚書李端棻，因曾保薦康有為、譚嗣同，也發往新疆。

康有為幸好早一天已動身到上海去，得到英國的保護到了香港，再赴日本。梁啟超進入北京日本使館，同一個日本領事化裝為獵戶，到天津坐船流亡日本^⑫。這以後一兩年康、梁在海外進行保光緒、救中國的運動。慈禧太后臨朝訓政，把光緒百日維新的新政策多半都改回來了。一些新設的掌理工商的機關未廢，但考試制度仍然規定用八股文，士民不許上書言事。光緒所廢的冗閒官職，如詹事府、光祿寺等，都恢復了。北京已經很少有變法運動的痕跡。京師大學堂剛剛設立，還沒有撤銷^⑬。

現在讓我們暫時離開梁啟超，來看一看上海一些商人的舉止言論。鄭觀應（1842-1921）在十八年前（1880）就已出版關於變法的重要論著。鄭觀應，廣東香山縣人，其父是一個塾師，其叔在上海充買辦。他十七歲參加縣試不售，即奉父命「赴滬習買」，並從其叔父學英語^⑭。他後來擔任太古洋行的買辦，同時則經營獨立企業。鄭氏於1880年參加官督商辦企業的事務，為李鴻章創辦的上海織布局、中國電報局的總辦或會辦，不久又參加輪船招商局的事務。鄭氏於1873年出版了一部《救時揭要》，推揚道教的善書，討論招工、醫道、犯人處置等社會問題。1880年他出版一部《易言》（書名的意義是言之匪艱，行之惟艱）。書中論考試則痛詆八股時文，論政治則深惜當時「政事之舉廢，法令之更張，惟在上之人權衡自秉，議畢即行。雖紳耆或有嘉言，末由上達」^⑮。1894

年鄭氏出版《盛世危言》，初刊五卷，次年又印《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十四卷。當時著書提倡變法的人當然不止鄭觀應。戊戌變法以前各家籌議變法的單行本書籍，除西人的作品未計外，略如下表²⁴，其中鄭觀應的著作和香港何啟、胡禮垣的著作，最為精彩：

初版年份	著者	書名
1880	鄭觀應	《易言》
1883	王韜	《弢園文錄外編》
1884	馮桂芬	《校邠廬抗議》(全書初刊)
1885	薛福成	《籌洋芻議》
1887	何啟、胡禮垣	《新政真詮》
1893	陳虬	《治平通議》
1894	鄭觀應	《盛世危言》(五卷版)
1895	鄭觀應	《盛世危言》(十四卷版)
1895	何啟、胡禮垣	《新政論議》
1896	馬建忠	《適可齋記言·記行》
1897	湯震	《危言》
1897	陳熾	《庸書》
1898	何啟、胡禮垣	《新政始基》
1898	邵作舟	《邵氏危言》

到了戊戌年，一部分中國商人對於變法的態度可以從經元善（1840-1903）的著述裏看到。經元善，浙江人，繼承他父親在上海開的仁元錢莊。他三十一歲接辦這家錢莊時已能背誦《大學》經注，「故終身立志行事，願學聖賢，不敢背儒門宗旨」²⁵。同時他對道教和慈善事業有興趣，頗似鄭觀應。1877年之後三四年間，華北大饑荒，經氏參加募賑；鄭觀應等商人推他主持上海的協賑公所。後來他也參加官督商辦企業，為上海織布局會辦、中國電報局總辦，與當時把持官督商辦企業的盛宣懷合作。但是經氏對盛氏以政治束縛經濟的作風，頗為不滿。在他眼中，盛宣懷有勢力又有財力，不精於業務，卻要控制業務。他引用一個同事的話，說盛「挾官以凌商，挾商以矇官」²⁶。經氏對官督商辦制度的不滿是他贊成變法的一個原因。

甲午中日戰爭時，經元善已讀到康有為的《長興學記》和《新學偽經考》。乙未年（1895）康有為來上海辦強學會，經氏為會員。強學會嗣被封禁，經氏一度曾批評康有為修養不足而好揚名，使「清濁兩途」皆不滿意。但經氏仍認為康、梁的變法方案，如廢八股，立議院，可視為醫學上的急劑或外科手術，以中國當時之情形言，確有需要。經氏於1898年6月致書盛宣懷為康辯護：「此君存心救世。現在朝野之病，如內蘊熱毒，痰迷心竅，非有大承氣湯一服，斷不足以去邪而還涼。天如不亡中國，此人必不能遏阻。」²⁷經氏認為康、梁欲救中國，無可厚非；同時則認為中國社會有基本的道德問題與教育問題，須自提高女學與母教入手方能解救。

經氏於1897年與梁啟超合作，在上海創辦女公學²⁸。盛宣懷等官員本來答應支持，但不久有京官議論其事，盛的屬下因而卻步，連鄭觀應都不願捐款了。據經氏追憶：「詎料一聞朝士不以爲然，市中有虎，即仰承意旨噤若寒蟬，避如碩鼠。」²⁹上海租界女公學總塾公議停止，但經氏另稟南洋大臣劉坤一准於上海縣城內設分塾，勉強維持。戊戌年（1898）經氏在上海縣城修建陳忠愍公祠（陳化成是於鴉片戰爭中在上海殉難的軍官），又創立一個會叫做「經正集」。這個會的公啟裏說做效西法必須同時注重正學：「本根不固，雖新學日興，吾恐終無以振吾國而反重貽世道之憂焉。」³⁰經氏創辦的女塾分學設在陳公祠背面，似乎是藉忠烈祠來保護女學。

經氏任職於電報局，隨時注意時事。己亥年末（已到1900年初）有慈禧太后爲同治皇帝（不是光緒皇帝）立儲之事。陰曆十二月廿四日（即1900年1月24日），太后臨朝，封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爲皇子（大阿哥），有廢光緒帝之意。經元善對光緒帝之變法，極爲感佩。陰曆十二月廿五日（1900年1月25日），他接讀建儲詔的電文大爲震驚。據他追憶：「去臘二十五日下午，接立儲電詔後，頓覺風雲慘淡。又聞西人得信，有元旦改元保慶之說，中外人心惶然……夜半先電北京某大臣，請其聯合朝士立諍。次晨復云：大廈將傾，非竹頭木屑所能支。夫大臣不言，則小臣言之。」經氏乃聯合上海紳民發電抗議，請總理衙門代奏，求「聖上（光緒帝）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憂勤，下以弭中外之反側」。³¹這篇由經氏領銜的電文，有一千二百餘人聯署，其中有章炳麟、唐才常、蔡元培等。太后看到代奏的電文後大爲震怒。諭旨指經元善爲叛逆。經氏嗣走避澳門。

這時梁啟超已經到了檀香山。梁氏出走日本的頭一年是他思想又有猛進的時期。他在1900年之前立論仍常以康有爲的大同思想及三世說爲憑，他雖然頌揚光緒皇帝，但他的愛國思想似漸超出儒家忠君倫理的範圍。他到日本後便宣傳戊戌一年光緒帝的英明、慈禧太后的愚昧。他一邊參與辦理學校之事，同時則讀書、辦報。橫濱於1898年底之前已有大同學校，後來神戶有同文學校，東京有高等大同學校³²。梁到日本後不久即創辦《清議報》旬刊。梁自著之《戊戌政變記》及譚嗣同的遺稿《仁學》都在《清議報》連載發表。梁啟超在國內便已開始學日文，到日本後便從日文譯著中探求西洋的法律思想、政治思想。《清議報》1899年內已開始介紹歐洲思想，翻譯政治學理論³³。梁氏在上海、長沙時已經討論民權。到了1899年則進而論民族國家的公民觀念：「法國人之言自由平等也，意大利人之言統一獨立也，日本人之言尊王攘夷也……豪傑之公腦，即國民之公腦也。」³⁴公腦一詞似是採用日文的翻譯名詞，但意義卻很清楚。梁氏在《清議報》連載的《飲冰室自由書》中常常討論歐洲的思想家，到了1899年年底已注意到蒙的斯鳩（後來嚴復譯爲孟德斯鳩）的法律論及政體論。梁啟超已注意到「專制政體、立憲政體、共和政體」的不同³⁵。梁啟超的思想已從新的理論和新的事實尋找根據，漸超出康有爲的範圍了。

《清議報》第三十一冊（1899年10月25日）第一篇文章，《中國歷代革命說略》，使用民主、革命、共和等字眼，說：「或謂中國無民主種子，革命後不能為共和之治者皆大謬誤，不知孔子之大義者也。」^③這些名詞康有為當時不願用。康氏於1899年3月離日本去加拿大，7月裏在域多利埠成立擁護光緒皇帝的保皇會。日本橫濱的分會由梁啟超主持。但梁氏當時不但對共和政體有興趣，而且已和興中會的革命分子有聯繫。他曾與楊衢雲會晤，後來又與孫中山約談。梁去檀香山，計劃去美國大陸，是康有為要他和各地華僑聯絡；孫中山曾寫信介紹其兄德彰及其他在檀香山的朋友^④。至少在1899及1900之間，梁啟超是願意考慮共和政體的——他對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因此更嚮往了。他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裏說：

誓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
問政求學觀其光。
乃于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臘月晦日之夜半，
扁舟橫渡太平洋。
其時人靜月黑夜悄悄，
怒波碎打寒星芒。
海底蛟龍睡初起，
欲噓未噓欲舞未舞深潛藏，
其時彼士兀然坐，
澄心攝慮游窅茫……
驀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
乃是新舊二世紀之界線，
東西兩半球之中央。
不自我先不我後，
置身世界第一關鍵之津梁。
胸中萬千塊壘突兀起，
斗酒傾盡盪氣迴中腸，
獨欲獨語苦無賴，
曼聲浩歌歌我二十世紀太平洋。^⑤

梁啟超是這樣迎接二十世紀的。他的生命有豪情萬丈的一面，又有正視現實、獻身政治的一面。（他到了1903年才到北美洲，作《新大陸遊記》。）^⑥1900年7月他收到上海的電報，立即從檀香山回國。那時慈禧太后縱容義和團、向世界各國宣戰的政策已破產了。梁的同志唐才常等於7月26日在上海召開「中國議會」，是一場成功的集會^⑦。但是唐才常等與會黨聯合舉事勤王的自立軍卻慘敗了。8月下旬唐才常等二十人在漢口被捕戮，在湖南的同志有一百餘人被捕殺^⑧。梁啟超回到上海聽到這個消息，知道他又只好出國逃亡了。至少在梁啟超看來，中國是這樣走向二十世紀的。那時中國經義和團的奇禍，正面對着許多困難。但是十九世紀最後幾年的變法運動，以改革制度、開民智、興民權為宗旨，畢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光輝的一頁。梁啟超等人熱愛中國，同時則嚮往人權與民主，已經為二十世紀提出新的命題了。

註釋

- ① 梁啟超這一次於1899年12月19日離東京，於12月31日午後抵檀香山。30日夜舟仍在大洋中。梁啟超：《新大陸遊記節錄，附夏威夷遊記及遊台灣書牘》飲冰室專集，台北：中華，1972，頁1，155。梁啟超以1899年之「臘月晦日」為二十世紀之前夜，並以「二十世紀太平洋」名其歌，自有其詩人之自由。嚴格說來二十世紀須俟1901年1月1日始到臨。《牛津英文大字典》有十九世紀於1801年開始之說。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econd Edition (1989), II, 1042. 另見Joseph Whitaker, "The XIX Century", An Almanack for the Year of Our Lord 1901 (London: 12, Warwick Lane 1901), p. 670.
- ②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台北：中華，1960，卷四十五下，頁17-18。
- ③④ 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上海：人民，1957，第二冊，頁131-166；頁152-153。
- ⑤⑥ 引自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1983；下文簡稱《年譜長編》，頁42；頁67-68，另參看頁274。
- ⑦⑧⑨⑩ 《飲冰室文集》，卷一，頁10；頁28；頁42-43；頁94。
- ⑪⑫ 《年譜長編》，頁88；頁84。
- ⑬ 本文紀事年月，除另說明外，悉用西曆，主要根據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台北：自印，1963。
- ⑭ 《年譜長編》，頁90-92。
- ⑮ 《飲冰室文集》，卷二，頁67。
- ⑯ 請閱孔祥吉：《戊戌維新運動新探》，長沙：湖南人民，1988；參較 Luke S.K. Kwong: *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Ideas of 189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East Asian Council, 1984)。
- ⑰ 1899年6月21日至9月20日之間與新政有關的諭旨有205件之多。《戊戌變法》，第二冊，頁17-99。
- ⑱ 同上，頁84。另見《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台北：華文影印，1964，卷四二五，頁13-14。
- ⑲ 《戊戌變法》，第二冊，頁91；《德宗實錄》，卷四二五，頁21。
- ⑳ 《年譜長編》，頁156-157。
- ㉑ 新設的礦務鐵路總局一時還存在，但是主要官員多為政變後委派之人。例如12月8日派胡燏棻督辦天津至鎮江的鐵路，以張翼(開平煤礦的督辦)為此鐵路幫辦。京師大學堂年底增設師範館；次年5月有御史批評京師大學堂糜費過甚，旨命「認真整頓」。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頁1027-1045。
- ㉒㉓㉔㉕㉖㉗ 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台北：聯經，1990，頁419-420，598；第八章；頁603-606；頁607-608；頁609-614；頁615-616。
- ㉘ 同上，頁616-617。梁啟超在《時務報》四十七冊裏說：「此學堂現為經聯珊[元善]太守總其成，已於十月二十六日在滬之高昌廟桂墅里鳩工，訂期明年三月落成，首夏開館。」轉引自《年譜長編》，頁72。
- ㉙㉚㉛ 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頁617；頁618；頁619-620。
- ㉜ 《年譜長編》，頁72-73，170-171，183-187。

⑳ 例如《清議報》第二十三冊(1899·8)至第三十一冊(同年10月)連載之「國家論」，介紹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之說。

㉑ 文章接着說：「豪傑有公腦，則數十數百人如一人……國民有公腦，則千百億萬人如一人。千百億萬人如一人，天下事未有不濟者也。」《清議報》第三十二冊(1899·12，本冊脫期五旬)，頁6。

㉒ 同上，頁6-8。《飲冰室自由書》的小序裏說：「莊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以名吾室。西儒彌勒約翰曰：人群之進化，莫要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備於我焉，以名吾書。」同上，二十五冊，頁15。

㉓ 同上，第三十一冊(十月)，頁1-3。

㉔ 《年譜長編》，頁178-183。

㉕ 見②。

㉖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節錄》，頁1。

㉗ 這次集會參加的人有容闈(公推為會長)、嚴復(公推為副會長)、唐才常(公推為總幹事)、林圭、沈蓋、狄葆元(三人公推為幹事)、章太炎、文廷式等至少八十餘人。見杜邁之、劉泱泱、李龍如編：《自立會史料集》，長沙：岳麓書社，1983，頁8，13。

㉘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1090，1096-1097。

劉廣京 是有數的中國近代史專家，早年負笈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曾在哈佛和耶魯大學任教，自1963年出任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歷史系教授迄今，目前，並擔任系主任。劉教授著作宏富，早年致力於十九世紀的中國航運、經濟、中美關係研究，近年轉而對政治改革、經世思想發生興趣，最近出版的巨著《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可為這時期工作的代表。劉教授已被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